

# 汉语西传三百年

## ——16至19世纪来华传教士眼中的汉语

□ 邵则遂 陈晨

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与罗明坚在中国建立了天主教第一所教堂,拉开了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帷幕。对于传教士而言,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是第一要务。从整个16至19世纪300年的历史来看,传教士是汉语学习与研究的主力军,推动了中西思想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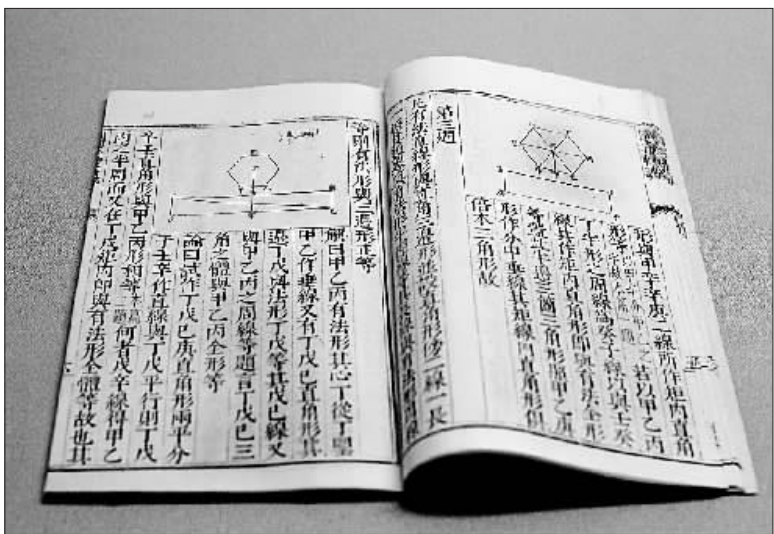
### 中国话:从让人头疼的“鸟语”到日臻全面的语音研究

学会汉语发音让传教士们颇为头疼,他们认为汉语发音需要“鸟”的唇舌,在欧洲甚至产生了中国人需要随身携带带板子写字交流的“传说”。

为解决语音学习的问题,传教士们采用了汉字拉丁字母注音方案。罗明坚与利玛窦共同编写的《葡汉辞典》就是采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最早尝试。不过,这套系统有一大缺陷,即没有标注汉语声调和气音状况。后来,利玛窦在郭居静神父等人的帮助下,参照乐谱音阶确定了汉字音调,选用了拉丁语中“一”“二”“三”“四”“五”五种符号分别表示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和入声,同时选用C作为送气音符号。这套更成熟的注音方案在《西字奇述》使用并得以推广。金尼阁1626年所著《西儒耳目资》中的注音方案也得到传教士们的认可和支持。

进入19世纪,随着欧洲语言学的影响,西人在研究语音时已经具备了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方法和思想,例如音位与音位变体观念,即在区分语音时考虑其区分意义的社会功能,把处在互补关系中的相似音素用同一注音符号表示,增强符号的表音弹性。此外,他们对汉语中较为特殊的一些语音及其发音方式的研究也有所发展。例如,舌尖前元音与舌尖后元音的区分就是一个从无到有、逐步清晰的过程。语音分析的准确性在提高,认识在加深,汉语官话的音系架构也日趋完善。

可以说,这3个世纪中,传教士们对汉语口语的评价从最初的抱怨连篇逐步走向科学理智。虽然可能难以摆脱对汉语口语的刻板印象,但是传教士们仍在试图以相对客观



利玛窦《国容较义》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的方式对语音进行描写。随着汉语研究的深入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西人的汉语拉丁字母注音方案日臻完善。这些语音文献为汉语语音的历时研究提供了素材,也为汉语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 神秘的汉字:从“神的旨意”到词源根字的探寻

和汉语口语的情况类似,西方人最初对汉字也抱有较为负面的评价。其主要原因是汉字不具有表音性,传教士们需要记忆大量的字符才能初步具备汉语的读写能力。

虽然传教士们在学习汉字上有诸多抱怨进而产生一些偏见,但不可否认,他们也把汉字的相关知识带到了欧洲。曾德昭曾率先指出中国语言极其古老,可能是巴别塔7语言之一,更为接近上帝的思想。在解释汉字的象形义、构建世界图景时,一些传教士融入了基督教的理想。18世纪的索隐派就是典型代表。以白晋、马若瑟为代表的索隐派传教士尤其对《易经》之类的典籍感兴趣,他们对中国古代经典神秘意义的解读和对汉字的分析相辅相成。在基本笔画和字形的基础上,他们对其他的汉字各个部分进行解构、分析、系联,搭建出一套汉字的解读方式。例如,马若瑟曾在《中国

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义痕迹》一文中多次提到有关“羊”的例子。“羔羊”(sheep)在基督教中一直被视为基督耶稣的象征。马若瑟在谈到《诗经·大雅·生民》中周始祖后稷之母姜嫄之名时,就指出“姜”中的“羊”即为神之羔羊基督耶稣,“姜”字表耶稣由她孕育,而“嫄”字表其童贞之源。在分析“善”的异体字“譱”字时,马若瑟认为它是“言羊”和“羊言”组合,可以解释为谈论羔羊(“言羊”)和羔羊说的话(“羊言”)都是好的。

索隐派的兴起与18世纪欧洲词源学的兴盛和神秘主义传统不无关系。在文艺复兴晚期,欧洲人热衷于探寻语言的起源,例如在欧洲语言中探寻最原始的词根。对汉语则是通过对汉字字形解构式的分析与阐释,以类词源学的方法寻找汉字中传达的基督教真理。这种释义的方法是一种过度的解读,是传教士们构造和解读世界时的心理映射。他们的汉字研究与其说是语言学的探讨,不如说是神学的论述。

索隐派也受到了西方人的抨击,到19世纪后逐渐式微。不过,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推动下,词源学发展势头不减,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对汉字意义的探索也并未就此终止,而是进入了音形义的新阶段。卫匡国《中国文法》的出版,将汉字214部首介绍给西方人。受其影响,西方人认为这214个字如同西方语言学构词法中的“词

根”,只要了解了这些“字根”的基本意义,就可以理解由其构成的复合字的意义。这样的分析法,可以帮助记忆汉字,但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汉字。比如“缘”字,由“丝”和“泉”构成,但在意义上却难以像印欧语中那样直接由“丝”和“泉”两个字根叠加以解释。

西方人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识到复杂的汉字的确是由简单的汉字或部件组合而成,但是汉字中最重要的表意的部件并不是部首。19世纪英国传教士马士曼的《中国言法》提出了汉字中根字(primitive)、构字部件(formatives)和派生字(derivatives)的观点。他指出,部首仅是根字中的一个部分,同一字根生出的新字与根字之间的关系是字音相近,部首不同。这一问题的发现,促进了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对汉字音形义关系的积极探索。他们开始注意到构字部件的表音功能,从而进一步推导出音音相近相近汉字在意义上和词源上的关联性。

19世纪正是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盛行之时。欧洲人对词源的研究以语音为起点,通过比较亲属语言之间意义相同且语音有对应关系的词来确定同源成分,这也是由印欧语言字符的表音性所决定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对汉字从“形”到“音”的转变与这一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传教士们逐渐走出了对汉字形体神秘解读的执念,以更加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结构汉字,从而发现真正的汉字要诀,进入了真正的语言学研究的视野。

### 汉语语法:从削足适履到求同存异

欧洲的语法研究起步较早,16世纪时传统的拉丁语法已经相当成熟。相比之下,中国虽有《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汉语研究的专著,但较侧重于语义与音韵,对汉语语法与句法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就连grammar一词的对译词“文法”也是清末从日语中借来的。

早期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都

是以拉丁语法为依托。1652年,卫匡国完成了《中国文法》一书。他将汉语划分出十大词类,并在动词部分对汉语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有所介绍。1703年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依旧沿袭拉丁语法,进行词类划分,并对其形态和范畴进行描写。除此之外,对汉语的一些造句规则(主要是主动句型和被动句型)也进行了归纳说明。1728年,马若瑟的《汉语札记》首次区分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语法规则,指出了汉语中“实字”与“虚字”的区别。不过马若瑟并没有依照拉丁语法构造汉语语法规则,而是从语言事实出发对汉语进行描写,这样的做法更符合汉语语言的实际情况。

进入19世纪,随着欧洲汉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专业学者投身于汉语的语法研究中。法国汉学家雷慕莎的《汉文启蒙》在词类划分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句法规则,并指出汉语的语法不能用西方传统的拉丁语法去生搬硬套。在传教士方面,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其系统性比之集中的语法专著更强,但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词法上,句法部分只归纳了九条规则,仅占五页篇幅。马士曼的《中国言法》在汉语语法本体研究上,也是由八大词类入手着重讨论词法,对句法的讨论较为简单,甚至有时句法与词法的界限并不清晰,将许多构词法放入了句法部分。艾约瑟的《中国官话语法》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除词法外,他对汉语语法规则的考察也颇为详细,这是此前西方人研究中所少见的。

整体看来,16至19世纪西方人所构筑的汉语语法体系自始至终都有着“拉丁化”烙印。不过,随着认识的加深,他们也敏锐地认识到了中西语言差异。例如万济国提出“词无定类”的思想,后被《马氏文通》所吸收。马若瑟则是脱离了拉丁语法研究的范式。汉语中的虚词、语序等问题也逐渐进入到视野中。汉语语法的研究开始从“削足适履”式的套用慢慢走向“求同存异”式的共进。

(作者分别系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教授、讲师)

### 国学动态

## 文化创新的新依托:“故宫学”

### ——“国学新视野下的故宫学与人文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故宫学是一门以紫禁城宫殿、宫廷文物藏品与故宫博物院为中心研究对象的学问,2003年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提出,至今已有15年。近日,深圳大学人文学院联合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在深圳举办了“国学新视野下的故宫学与人文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高校的近百位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

故宫研究院原院长郑欣淼指出,故宫学持续发展的活力在于学术人才的培养。为此,故宫博物院与国内多所高校联合开展交流合作,已与部分高校联合进行故宫学方向硕士、博士人才的培养,这将极大地发挥二者在学术资源和学术人才方面的

优势互补作用。郑欣淼还从学术定位、业务工作、研究机构、出版成果四个维度回顾了故宫博物院民国时期的学术史,肯定了故宫博物院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段勇指出,15年来故宫学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故宫学已成为文化建设的亮点和热点,他强调紫禁城的价值是故宫学的核心;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则从学科建设角度介绍了故宫学的概念范畴与学术体系,涵括明清宫廷建筑、珍藏、礼仪制度及故宫博物院的博物馆建设等。

故宫学进课堂,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近几年,故宫学进课堂在一些高校陆续开展起来。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上海大学、深圳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已开设或拟开设“故宫学概论”等相关通识教育课程。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景海峰认为,通过

国学新视野概念,把故宫学的研究同当今人文学科的教育结合起来,具有时代意义。郑欣淼表示,故宫常年有“故宫学高校教师研习班”,在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将故宫学纳入大学的公共课程体系,进行基础性的人文通识教育,通过故宫学文化知识的涵养,可以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章宏伟指出,故宫学作为一门人

文学科的研究,必须走出红墙,他希望和各高校联手,积极推动故宫学进入高等教育框架。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许丹认为,故宫学体现出“博学”与“专精相统一”的个性化素质教育理念,特别适合作为通识教育,她希望在教学中传递“大文物”“大故宫”“大传统”“大学科”的学术观念。山东大学大学邹强、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黎诚则分别阐述了故宫学与人文美育、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

故宫学与文化创新是会议的另一议题。与会学者围绕故宫学与传统文化的新发展模式与新思考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刘洪一认为,文化及相关产业将成为深圳新的发展增长点。故宫学与优秀传统文化对城市发展有重要的文化滋养与引领作用。美国西来大学教授龙达瑞认为,故宫学是国际性的学科,希望更多懂外语的同行,把故宫学带到世界各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田启波指出,故宫学研究有

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上海市社联面向全国学者的创世神话“项目成果汇报”程序中,黄景春介绍了涪川西王母的神话新构及仪式重建的问题,指出西王母神话可以开发地方经济(如旅游开发),张杨地方文化个性,服务于国家的宏大战略。杨利慧长期从事女娲神话的调查,对自己近年来所做的伏羲女娲田野调查情况做了介绍,体现了创世神话田野研究的特色。高有鹏从神话传承的三种方式文字的传承、口头的传承、生活的传承入手,介绍了中国神话群的基本形态。从“神话群”的认识出发,可以理解神话不仅是纪实,是历史的,也是生活的。孙正国以虎文化为研究对象,介绍了其传承谱系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通过文化史的梳理来重建虎文化的谱系;第二,以考古

助于人才整合和跨界思维培养。敦煌研究院文献信息中心夏生平分享了敦煌数字文化遗产“跨界、融合、分享”的模式。南开大学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部主任何庆基表示,各研究单位加强故宫学的研究与教育,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自信。

与会学者还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对故宫学进行了阐释。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指出,中联联承载着康熙帝海外道里测量的政治使命及琉球在文化上与中国同文一体的特殊寓意,其意义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唱酬互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元周根据《燕行录》部分记载,参考相关资料,说明使臣与沿途各邑音乐表演之关系,并对其中主要几种大乐府曲目表演加以详细说明;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沈金浩以“宫体与台阁体”为题,对宫体和台阁体两种文学体式的内涵与关系进行了剖析。(高志忠)

材料为切入点来重建虎文化的历史谱系;第三是充分发挥虎文化的资源,加强对虎文化在内在的传世神话的认同。毕旭玲放映了《大禹神话—北川篇》的短片,内容包括北川生态人文博物馆的介绍,农历六月初六大禹祭祀仪式的呈现,非遗传承人等访谈对象的口头讲述,相关碑刻、景观等实物呈现,等等。

中华创世神话是以互动性、整体性和认同性为本质的文化谱系,各地区、各群体、各官庙的互动,建构了中华创世神话的多元一体特征。本次研讨会提出了构建中华创世神话联盟的倡议,提出了资料共享、平台共建和成果共推的基本思路,为建立创世神话的文化谱系,建构文化认同,开拓了中国传世神话学研究的新方向。(游红霞 李柯)

2007年,由牟钟鉴、王殿卿、丁冠之、骆承烈、刘示范、钱逊、周桂朝、郭沂、田辰山、颜炳罡、于建福、陈洪夫等20多位老中青年儒学学者,在山东泗水地方支持下,发起和创建尼山圣源书院。这所位于孔子出生地的书院,用“圣源”的字眼表达了鲜明的文化立场。

尼山圣源书院始终与时代同步。10年以来,尼山圣源书院以“弘道明德,博学笃行”为院训,实行“民办公助,书院所有,自主运作,世代传承”运行体制,以学术论坛、教育基地、游学营地、学术研究为功能目标,坚持“返本开新”,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发展的座右铭,开创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形态。

培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才是书院首要的工作。2009年以来,书院在国际儒联支持下,与台湾中华孔孟学会合作,举办“海峡两岸读《论语》教《论语》师资研修班”,连续10年举办10届,全国10余省市8000余位中小学教师和教师接受了培训。2013年4月至2018年9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和尼山圣源书院,先后举办48期“国学经典教育”专题研修班和3期“坚持立德树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修班,培训全国教育行政干部、校长、园长和国学教师6000多名。书院还与济宁市开展“一校一导师”培训,培训国学导师4600多人,校长1000名。总结尼山圣源书院的教育经验,可以说他们根据时代的需要和自己的专长,为当代教育改革培养了人才。

为了响应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号召,让西方学者可以原汁原味地掌握中华文化,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于2011年,在尼山圣源书院首倡的“国际儒学与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讲习班”,至今已在不同地点连续举办7届,为亚、欧、美、澳、非等5大洲10多个国家培训了250余位师资。书院与国际儒联、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联合连续开办“东南亚华人儒学研修班”5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地华人共200余人参加学习。书院面向中外教师的培训,均为公益、半公益,这符合书院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性质和初衷。

2011年至2017年,书院与国内外著名大学合作,分别举办以“何谓中华心”“儒学的当代价值”“孔子回家”“经典诵读与人文素养”“儒学复兴的现状与未来走向”“国学经典价值与高校通识教育”等为题,以稷下学宫为楷模的8次传统“会讲”,有跨校青年导师与博士生、硕士生500多人参加,成为打破现行教育分科体系,探索培养高端文科人才的流动站。与此同时,在尼山圣源书院发起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已经成功举办5次,而且尼山圣源书院已经成为论坛永久会址;举办“尼山新儒学论坛”4次;举办“儒学名家圣源论道”两次;举办学术会议多次。尼山圣源书院开展的儒学研究活动,重点在于探讨新时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学存续数千年,有其独立而完整丰富的学术传统,但又兼容并包,荟萃精华,广泛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但儒学不应完全以“西学”立场、体系和方法进行诠释、研究,这使儒学丧失独立性,更无法重树其主体性。我们努力探索立足中华文化本位,用儒学的精神指导研究儒学。

在颜炳罡、赵法生副院长等的带动下,尼山圣源书院从书院周边的北郊野村开始,进行乡村儒学实践,开展了有声有色的乡村儒学讲堂,为儒学的落地与民间传播做出了积极探索与示范。乡村儒学在山东已经开展了5年多时

间,在书院所在地的圣水峪乡形成了7个教学点,乡村儒学义工队伍上百人。山东省的乡村儒学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并自发地波及北京、河南、湖北、江苏、黑龙江等省市。尼山圣源书院或许不是当代成立最早的“儒学”书院,但无疑却最有影响力。尼山圣源书院的创办充分体现了儒学学者的当代自觉,从主体、精神、宗旨、运行机制和社会效果等多方面传承了古代书院精神,又在传播当代儒学方面做了探索。书院是儒家的道场,由民间发起并主导的当代书院复兴呈现出儒学复兴的迹象,但其间的艰难险阻也显而易见。

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制度与古代完全不同,存在发展于古代社会的儒学,必须经历“现代转型”,这仰赖深明传统的学者。理性对待传统的政府以及适合传统“转型”的民间生态。古代书院依赖的官方、乡绅、士林支持以及“学田”制度存在的基础都不见了,对其现代支撑的探索道阻且长。以上这些困难和阻力,现实地存在于当代书院生存发展的实际里,必须克服和解决,书院才有可以期望的未来。当代书院发展的共同困难可以概括为缺钱、缺人、缺思想(学术),具体到每个书院,缺的程度和比例有所不同。如果说,当代书院的呈现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的结果,那么,这些困难和阻力的存在或许说明“自觉与自信”的程度还不够。

那么,我们看看尼山圣源书院是如何解决这些困难,走过10年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书院名誉院长牟钟鉴总结书院所以能够办得出色,主要有三条:(一)书院处于孔子出生地,传统土壤深厚,人有尊圣希贤之心,地方党政部门高度重视支持,社会贤达鼎力支持,提供政策环境和物质空间;(二)有一批志同道合、前赴后继的事业骨干,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不计功利,知行合一,勤俭办院,杜绝铺张,不拘一格,努力开拓,“以儒家精神办儒学的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一大批老中青学者无私投入是事业成功的关键;(三)开放包容,书院虽无专职队伍,却有省内外、海内外数量可观的有识之士和学者支撑,使书院扎根泗水、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实践着“继承古代书院传统,适应当代社会发展,推动各种文明对话,促进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办院宗旨。明体达用,守常应变,是儒学的一贯精神,以儒学为主导的书院,如何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值得期待,更值得关注和重视。在一千几百年的书院,应与中华文化一道,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光彩。(作者分别系尼山圣源书院院长、北京市明德书院院长)

# 國學